

河南 文史资料

1992

4

(总第44辑)

★ 豫陕巨商毛慶岑

★ 吴佩孚的戎马生涯

★ 贾边社会主义在中国

★ 南阳的戏曲

★ 袁世凯葬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者的话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亲爱的读者，当你读到这一辑《河南文史资料》的时候，我们又和大家一起度过了改革的一年。

这一辑第一个栏目是经济史料。其中《豫陕巨商毛虞岑》一文，详尽地记载了毛虞岑的发家过程和经营之道，对今天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人们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20年代的河南，战争连绵不断，胡景翼、岳维峻督豫时期的战况如何，你将从《中州烽烟》栏的几篇文稿中看到一个侧面。“费边社会主义”，这个今天鲜为人知的名词，在40年代的中国却有一些人努力地研究它，宣扬它。本辑刊载的《费边社会主义在中国》一文，会使你对费边社会主义在中国、在河南的传播情况有所了解。这一辑的人物史料仍占有一定的篇幅，《中原人物》栏刊载的几篇史料，分别记述了晚清进士王肖庭、诗人和文物收藏家张伯驹、语言学家赵荫棠、乡村建设人士王柄程等人的事迹。袁世凯，原籍河南项城，他在直隶总督任内回乡安葬他的生母，这一事件在当时曾经轰动远近，本辑《社会百态》栏所载《袁世凯葬母》一文，把那浩大的场面告诉给了今天的读者。

1992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就要到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编辑部全体同仁衷心希望读者对《河南文史资料》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这本刊物在新的一年里办得更好。



河南文史资料

2A96/30
季刊

经济史话	豫陕巨商毛虞岑	徐滋叔	4
	郑州花行旧闻	张炎卿	15
	河南开办直接税的经过	袁家奇	19
	解放后河南第一个民办信用社	杨 达	24
吴佩孚的戎马生涯		李明轩	29
刘镇华的前半生		吴沧洲	56
中州烽烟	督办河南省军务之胡景翼岳维峻	齐惠吾	68
	胡景翼之死目击记	霍道轩	70
	1925年鸡公山会议的前前后后	马彦祥	71
	岳吴信阳之战	王锦山	77
政海波瀾	统一党共和党在河南	陈长河	83
	费边社会主义在中国	聂常庆	89
	民盟河南省地下支部建立前后	卢治国	101
南阳的戏曲		王兵翔	109
曹东扶与光化国乐社		杜豫生	11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中原人物	晚清进士王肖庭轶事	王家璧	123
	中州文人三题	张中行	133
	乡建派人士王柄程	王 敏	143
	爱国爱乡的鲁紫铭	阎树梅	149
	我的老师涂心园	郝育森	153
	郭海长在复旦大学	燕 凌 宋 铮	158
	忆海长	郭也生	165
社会百态	袁世凯葬母	李相宾	170
	智擒匪首连天生	毛汝采	176
	匪首扈全禄杨富落网记	辛长山	181
	潢川剿匪琐忆	王继荣	186

河南自治史略(续)	190
-----------	-----

质疑·订正·补充	221
----------	-----

补	钱穆在河南大学(69) 宝鸡申新公司资助河大师生(118)
	漯河红十字会救护队(132) 张伯英修建淇县民生渠(164)
白	嵩县龙驹白麦(169) 卫辉同乐班(175) 磕头牌香烟(189)

主编 袁 蓬	副主编 魏一明 王锡朋 高蓉生
--------	-----------------

豫陕巨商毛虞岑

徐滋叔

毛虞岑，河南郑州毛庄人。家中有田地数十亩，在本乡算是一个小康之家。他自小只读过两年私塾，识字不多。成年后，家里为了安排他的职业，在本乡开了一个小杂货铺，让他学做生意，由于经营不得法，亏损而停业。毛虞岑在家不能安身，只好出外自谋生活。开始他投入张敬尧部当兵，因在湖南打了败仗，又跑回郑州，在平汉路上当路警，往来于郑州、石家庄一带。他利用乘车方便的机会，贩运香烟，又和友人在郑州合伙开了一个华兴香烟铺，借以维持生活。这时，有几个有钱的友人，集资在郑州车站后边建起一个规模不小的华阳春旅馆，需要物色一个管事人，毛虞岑适当其选，到华阳春旅馆担任了管事。旅馆里各方面人士往来很多，毛就认识了一些朋友，我就是其中的一人。到1934年，华阳春旅馆因范围大，开支多，赔亏很重，毛虞岑支持不下去，亟谋摆脱，恰好这时国民党政府在郑州地方开征土膏税，准许商人领照设行，代客买卖鸦片。毛虞岑看准机会，千方百计地领到一张土膏行营业牌照，牌号益泰祥。依照当时政府规定，土膏行资本额至少要有1.5万元，毛虽领到了牌照，但自己没有那么多钱，筹集资金成了问题。曾有人给

他3000元买他的牌照，他没有出让。最后经我介绍一位博爱县的财东黄子益，向他的土膏行投资7500元（其中有我的2500元），毛自己又凑集了7500元，这样，益泰祥即于1935年5月在郑州开业。黄子益派一个名叫白缉光的为副经理，毛虞岑任经理。那时候毛虞岑在豫陕的声誉并不响亮，遂用一位在西安市面有信誉的王铭轩为其张罗。当时烟土价步步上涨，陕西的产烟土地地区在灾荒之后，需要食粮，所出产的烟土，又需要出境，毛虞岑就抓住机会，由漯河、徐州、蚌埠一带运面粉到西安出售，再由王铭轩在西安采购烟土运到郑州一带销售，往来都有暴利可图。当时西安购买烟土，惯例是先交货后付款，中间相隔20天或一个月，往往议定价格后烟土价上涨，待交款时就赚得一笔钱。西安事变时期，陕豫交通中断月余，郑州烟土价涨，陕西烟土价跌，毛虞岑由陕西大量购进，从中获利很多，真是生意兴隆，大发其财。

毛虞岑虽然识字不多，但脑子并不笨。他参加过帮会，讲江湖义气，经营方式也多种多样。他待人宽厚，说话讲信用。他亲自掌握营业权，遇事有分析能力，处理问题果断，也能同职工共甘苦。他对家人约束极严，任何亲属不准在号里长支挂欠，家中无私蓄。他虽好赌，但从不在号里赌。所有资金，不论多少都用在业务经营上面。他小处不计较，大处着眼，在外为号中事应酬用款，从来不向号里报销。认为有利可图的事，一定千方百计地争取实现，决不放松。积累资金的办法也很多，同仁手中有余款时，不论多少都要劝其存柜，给予比一般较高的利息；年终分红，存柜作股，下年分红。他这种惠而不费的办法，当时博得同仁的好感，都乐于接受。在法币贬值期间，他有两句口诀：“存货不存钱，宁可欠着别人，不要让别人欠着自己。”他用了旧商人“内怕长支外怕欠”的经营方法。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军节节由东向西由北向南败退，直鲁地区相继沦陷。毛虞岑看到郑州势难立足，就一方面把郑州土膏行转移洛阳，一方面带着资金和同仁转移西安。他在郑州经营土膏行不足三年的时间，赚到手的钱，按一般估计，可能有1937年的法币10万元。

毛虞岑于1938年转移到西安后，仍由原班人马开了长泰祥土膏行。1940年，由于政府禁种烟苗，烟禁加严，毛虞岑就相机收兵改业。

1940年9月，毛虞岑的一个小钱庄德泰祥在西安南广济街93号正式开业了。当时登记的资本额是法币5.7万元，实际在内柜可以周转的资本是50万元，这是为了少缴所得税。西安当时的工商业经营者，都有内外两本账。德泰祥大约有职员三四十人，外柜做的是存、放、拆、汇等业务，后柜包罗万象，各货俱全。只要有利可图，任何业务都经营。开业以后，为了购销适时，兑换便利，先后在宝鸡、兰州等地开设了分庄，上海、重庆、界首等地派驻专人，其他较小城市有时也派人坐庄。因此，德泰祥的汇拨、囤销面越来越广，市面消息越来越灵通，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人员也就越来越多。尤其是代人汇款方面，往往由于交通不便，在收到别人现款之后，迟一个月或两三个月才付给，有较长的时间可供周转。当时法币不断贬值，毛的“存货不存钱”的计谋实施以后，获利之大，实难估计。

从1940年9月到1942年12月，是德泰祥极盛时期，赚了不少钱。钱赚到手了，就要顾全“声誉”。1942年底，毛虞岑在德泰祥内部作了一次结束，事前约请了一位银行熟手王萼楼为经理，进行改组。目的是要改进经营管理方式，把德泰祥钱庄上升为德泰祥银行。但在人事方面，事与愿违，发生了一些纠纷，勉强强

又维持了差不多两年，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愿望。

抗战胜利后，德泰祥钱庄的旁门裕泰、信义也都培养起来了，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了。旧人对新人，意见也越来越深了。毛虞岑看清了这种情况，感到已经控制不住，便商得大家同意，采取自愿结合的办法，分道扬镳。除已有的两个旁门裕泰号、信义号外，又分设了大千、英华、鑫益三个公司。而德泰祥本庄也就只好由中间派白缉光为经理，又约了两位银行界的人士郭抟九、王士元敷衍敷衍，做一些存放汇兑业务，一直到解放。

德泰祥钱庄前后经营差不多十年之久，它的盈利究竟有多少，因为他们是年年分账，无法统计，我只知道最后清理时，剩有西安、兰州、宝鸡等处的房屋和在和合面粉厂二分之一的投资而已。

裕泰号的经理人为张玉祥。张是河南新乡人，原是郑州中权银号负责人，是毛虞岑的朋友。在郑州土膏行初期，张玉祥在经营周转上帮过毛虞岑的忙。以后，张玉祥经营的中权银号停业，张到了西安，住在德泰祥钱庄。他手中多少有点钱，开始是在德泰祥牌照的掩护和头寸的支持下，作单干户，跑行商。大约跑了一年多光景，赚了一些钱，就吸收了德泰祥一部分股东和同仁的少数资金，逐步变单干为伙干，当时取了一个牌名叫裕泰。从此就在东大街开辟门面，大干起来。干了几年，年年赚钱，年年分红。大约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后，就又领到丰盛泰银号的牌照和裕泰金店的营业照，与母号德泰祥钱庄并驾齐驱了。这样一直干到解放。究竟赚了多少钱，因为他们的股本是随时增减，红利是随时分配，局外人是很难估计的。我只知道他们除每年分得红利外，比较大一些的股东，各人都有一处住宅，大股东有两三处的。到解放时为止，他们在西安西一路有一个裕大面粉厂，在郑州有一个榨油厂，最后每人还分得了不少现款。因为分配时起了纠纷，还

打了一场官司。

信义号经理人是赵香山。赵是河南人，抗战前就在陕西渭南经营永和煤厂，抗战开始时歇业，来到西安，在川陕道上用信义牌号贩运纸烟布匹。同时，因包销秦丰烟草公司纸烟，与毛虞岑、石凤翔认识，1941年以前，他也是在德泰祥的掩护下做运销商。到1941年脱离了德泰祥，吸收毛虞岑、石凤翔的股份在西安东大街成立信义公司。因为与毛虞岑、石凤翔有了合股经营的关系，在经济等方面得到很多有利的机会，一直经营到抗战胜利。在短短几年中，业务得到意外发展。他们每个大些的股东，都有一两处住宅；该公司还占有和合面粉厂全部股份的二分之一。解放后清理定股时，大约有股份20万元人民币。

抗战胜利后不久，毛虞岑赴重庆、上海治病，石凤翔也抽股去美国买纱机了，信义公司就不得不作一番结束，原班人马只好另行组织，成立了正义公司。正义公司开张后，做的是投机生意，赚了一笔钱，一直经营到解放。

毛虞岑财团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个旁门，还有三个别户：一个是大千公司，由王铭轩等经营；一个是英华公司，由张耀亭等经营；一个是鑫益公司，由王尊楼等经营。这些别户都是为了调剂人事关系面设的。我对他们的详细情况不清楚。

以上说的是毛虞岑在商业、金融方面的经营情况，下面谈谈毛虞岑在工业方面的投资情况。

先从漯河大新面粉厂说起。漯河大新面粉厂经理杨靖宇是我以往在漯河办烟酒税时认识的朋友，他是漯河商会会长。抗日战争开始的前一年，杨接办了大新面粉厂，需要添招一些股。经我和郑州益泰祥副经理白绶光的介绍，益泰祥拨出现洋5000元入了股，其中毛虞岑1500元，黄子益1500元，我的2000元。董事会

组成时，我担任常董。到1938年下半年，抗日战争战事紧张，平汉路上风声鹤唳，中央军步步退却，政府限令各工厂三日内拆迁后方。漯河大新面粉厂便匆匆地拆迁到陕西宝鸡十里铺，机器堆在露天，人住在小店里。这时，他们找我帮忙。我以董事身份，协助大新厂筹款购地，建筑安装，短短半年就将厂房建成，于1939年麦收时开始生产。毛虞岑看到大新面粉厂这样顺利地迁建完成，就认为我对办工业有经验，有办法，决定将陕西三原县的三泰面粉厂买下，由我来经营。

三泰面粉厂原设在三原县南关，是一个小型厂，日产面粉1.5万斤左右。开始是由几个山东商人组织起来的，1939年秋季，他们要出卖这个厂，经人介绍，毛虞岑就以4万元买了下来。买下后又拨了6万元，共计10万元股金，交我经营，让我担任经理，以陆荣常为副经理。在接办前，大家都没有考虑到三原是一个产棉多产麦少的地区，以及三原人不习惯食用机制面粉的情况。因此，开工后原料不好买，产品不好销，加上原动机需要的水源又供应不足，这就使得产、供、销都成了问题。日子久了，这些不良的因素竟成了这个厂的致命伤。正在为难的时候，毛虞岑碰到了西北运输司令何竞武（当时他在陕西省公路局局长任内），何谈到这次因修公路过汉中，据交通银行汉中行的经理唐嵩山说：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在褒城东周寨有一些土地，还带一个跌水^①，想利用水利来办一个电厂，正在找人。又说：汉中现在面粉奇缺，原因是枪毙了一个抬高粮价的面粉商刘纪才，以致无人敢到汉中销售面粉。听了这些，毛虞岑灵机一动，就托何竞武从中介绍，通过唐嵩山与祝绍周商谈，愿将三泰面粉厂迁往褒城，利用水力，扩

① 跌水，指使水流突然下降的台阶。

大生产，解决汉中地区吃面问题。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祝表示欢迎合作，并拨出 12 亩地（包括跌水），以其妻的名义作面粉厂的股份。这样一来，三泰面粉厂又有了生机。并确定全部股金为 300 万元，不足之数由毛虞岑凑集，名义上仍以我为经理（因我当时在西安经营华兴铁工厂），实际上由副经理戴少咸主持。戴少咸原名锡元，浙江人，工业学校毕业，曾在南京金陵兵工厂训练过艺徒，原是我聘请到西安华兴铁工厂教职工学习机械常识的。

三泰面粉厂从 1942 年着手迁建，年底新厂建成。可是一开始 300 万元资金就全部花光，还负了债。这时，正好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想要开发西北，来到陕西。听说他在重庆临行时，蒋介石叫他到西北想法多办些事业，以利后方。杜路过汉中，由何竞武、视绍周等陪同到三泰面粉厂参观，杜欣然同意投资 100 万元。后经毛虞岑等人筹集 100 万元，就改定资本额为 500 万元，并于 1943 年成立了董事会，以杜月笙为董事长。这样，三泰面粉厂也就站住了脚，不但制粉，还能碾米。由于利用水力，动力费很有限，因此成本较低。到 1945 年，由于股东们投有提取红利，资金就凑成了 1000 万元。后来虽然纸币疯狂贬值，但由于应付得法，三泰一直没有赔本。

1949 年冬季褒城解放前夕，胡宗南的部队路过汉中河东店，将三泰面粉厂粉楼及机器全部炸毁，并搜职工衣服行囊洗劫一空，幸粮食尚保住一部分，暂时可供职工们食用。职工们节衣缩食，表示誓谋复工。为了复工，戴少咸到西安与我共同设法购买了一些简单的机件，运回褒城。职工们日夜不停地为恢复生产努力，终于在 1950 年 7 月复了工。复工后，经营到 1953 年 1 月，实现了公私合营。1958 年 12 月，该厂改为地方国营，更名为汉中机械面粉厂。

我在 1938 年协助大新面粉厂迁建过程中，认识了国民政府经

济部工矿调整处派驻宝鸡工业区协助迁厂建厂的一些人，有人对我说：“现在后方的五金器材缺乏得很，你们可以派人到沦陷区去抢运一些五金器材、机器及零件，供应后方。”我当即转商毛虞岑等人，他们都很赞成。遂选派三泰面粉厂技师李荣林到沦陷区进行这一工作。由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发给通行护照，经过迂回曲折地绕道运输，先后运到陕西的有锅炉引擎、发电机、柴油木炭引擎，以及其他五金器材等，约有 200 吨。这些器材运到后，决定成立一个铁工厂，一面整理这些物资，一面再制造一些机器来供给社会的迫切需要。于是，在西安东五路城墙根下空地上建起一个简易工厂，定名为华兴铁工厂。聘请了技师，招集了一些由直鲁豫避难至陕的技术工人，于 1941 年开了工。工作母机是从河南孟县一个煤矿的修理部抢运来的。开始时设备极为简陋，只有两三部机床。经过职工们的努力，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把车、钻、刨、铣等机床配备齐了，职工达到 100 人以上，在当时的西安已算一个大型厂了。可是内部的股份没有安排好（用款都是由德泰祥钱庄挂支的），生产没有计划，厂址也太小。经毛虞岑与其他人研究，并请教一些内行人，作了如下的决定：1、资金总额为 1942 年法币 1000 万元，如不足再继续增加。2、在宝鸡十里铺购地建厂。3、聘请纺织专家王敬之研究制造简易小型纺纱机，并开始在厂里试验。

1942 年初，一面在宝鸡十里铺购地建厂，一面在西安进行纱锭的试制和试纺。到 1943 年厂房逐步建成，就把西安的机器和职工逐步转移到新厂，定名为泰华毛棉纺织厂，属于泰华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厂内分纺织和铁工两部分，初步装成 1000 个纱锭，接着陆续装置。到抗战胜利前后，能运转的已有 3000 纱锭（其中有一部分是湖北官币局的残破机架修成）。从此一直经营到 1949 年，净余额有 50 件纱的价值。这是纺纱部分情况。铁工部分在此时期

也制造了一些机器，其中以圆盘印刷机行销西北尤为突出。

这个厂由于设备简陋，在1949年秋天连续阴雨期间，车间屋顶倒塌，停工月余，损失极重，所有流动资金消耗净尽。解放后经宝鸡军管会大力支持，增资合营，但终因设备简陋，产品质量低，成本高，无法维持，于1950年4月停工变产，清偿了公私债务，经政府许可歇业。

泰华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一个泰华印刷厂。该厂原来是毛虞岑在郑州的朋友张殿臣等经营的云章印刷厂，在抗战初期亏损不支，毛于1940年春以10万元把全班人马（共60人）连同机器接收下来，迁到西安。开始时拨给100万元（后来随着法币的贬值，到1946年增加到1000万元），归泰华公司管辖，由赵宗廉任经理（赵是云章印刷厂股东），于1941年4月在西安开业。毛虞岑在接收这个厂之始，没有周密的准备，顾了朋友，背了包袱。开业之初，既没有门面市房，又没有适当的工作场所，只好在东五路北边一个小院里找了几间房。到1942年赵宗廉因家事请假期间，又委托中孚信托社经营了一个阶段，还是赔亏。到1944年8月由泰华公司收回自办，仍由赵宗廉任经理，于1945年在西安东大街搬到了市房，从1946年起由泰华公司增资，前后共1000万元，该厂才算步入正轨。

泰华印刷厂自从移设东大街以后，主要经营账表业务，并聘请会计专门人员经常设计各种账表，产品切合实用，受到各界欢迎，行销邻近各省，业务蒸蒸日上。一直到解放，年年赚钱，年年增加设备。解放前夕，赵宗廉跑到兰州，使业务受到损失。解放后，由于职工们的努力和泰华公司的支持，逐步清偿了公私债务，恢复了业务。1956年1月顺利地实行了公私合营。

和合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设在西安金家巷ABC三座大楼。原为

河南许昌商人牛贯五在许昌经营的一个中型面粉厂，机器是德国造的。抗战初期，牛贯五按照当时政府限期企业内迁的规定，于1938年将工厂迁至西安。由于牛本人资金有限，机器运到后，无力建厂，就租用金家巷通济公司的ABC大楼的东边两座，以东楼装置机器，中楼办公，勉勉强强开了工。干了一年多，不是没钱买原料，就是没钱发工资。停停开开，开开停停，眼看着要垮台。这时，就有河南朋友们出来问毛虞岑是否愿意接受盘让。毛虞岑自从接办三泰面粉厂以后，对于面粉厂的业务已经有些经验，手下也培养了一些熟手，同时感到牛贯五这套机器好，很快就商妥接受牛的盘让。决定筹集股款法币60万元（1941年的币值），由德泰祥钱庄和信义号两处各投资30万元，除付给机器让价40多万元外，其余股款作为周转金。毛虞岑自任经理，调三泰面粉厂副经理陆荣常为副经理，并从三泰面粉厂抽调了一些熟手。从1941年起和合牌面粉就在西安市面上出现了。和合面粉公司从开业到解放，逐步发展。从东边一个粉楼变成东西两个粉楼，业务越来越大，年年赚钱。但股东们自开业到解放，没有分过一次红利。

和合面粉公司于1950年下半年起由我（我为该公司董事会董事）向人民政府一再申请公私合营，1953年得到批准。1955年因粉楼裂缝，为安全计，分别合并于福豫、成丰两面粉厂，后来并入成丰厂的部分又随着成丰并入华峰厂。

除上所述，毛虞岑财团还办有一些小企业，如王铭轩办的华兴面粉厂、制药厂和石棉厂，丰盛泰办的裕大面粉厂、郑州榨油厂，程郁亭办的长安纺织厂等。有的多多少少赚了钱，有的多多少少赔些钱，都是昙花一现。

最后说说毛虞岑财团的瓦解。

上边说过，抗战胜利后，毛虞岑财团中的人分为三个别户，各

自独立经营，原来的德泰祥已成了形式。毛虞岑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一面跑到重庆、上海养病，一面忙着抽调自己的外汇，搞起个人的事情。这时候，正值法币疯狂贬值，物价直线上升，那些旁门别户还有利可图。到解放前夕，各自都赚了一些钱。这些到手的钱，他们决不会存着金元券让它贬值，也不可能都买成金条，而是购存一些商品，最多的是棉花，他们就把大部分的钱变成棉花，并在西安解放前运到重庆。意想不到的，1949年9月2日重庆大火，把他们所有棉花和其他货物一烧而光。这就是毛虞岑财团分散经营后的结束。

在重庆这场大火中，毛虞岑自己一点也没有受损失。因为他的大部分美汇早已调到香港去了，只用少部分钱买了棉花存在重庆。在重庆、兰州尚未解放时，毛由香港飞到重庆，以较低价格将存棉扫数卖掉。卖了以后，他以一部分金条托人带至兰州，处理了兰州德泰祥分庄的外债，也安排了他的家（毛的母亲住在兰州），⁴下余的不多金条又带着飞回香港去了。

1964年6月

本文编辑 魏一明

郑州花行旧闻

张炎卿

民国年间，我在郑州从当学徒开始，生活了 20 多年，亲身经历了这个城市的变化和发展，知道些棉花交易中的情况，现就记忆所及，记述于下。

郑州在没有修建铁路以前，仅是一个小县城，既不是陆路交通要道，也不是水路的船舶码头，因而不是商品的集散地。当时郑州人口不多，大部居民居住在城里，只西街有几家杂货、铁器和估衣店，南街有几家药材行店，东街、北街则都是居民，北街有部分回民散居。城外东、南、北郊都是沙丘，西关则是盐硝潮湿地区，十分荒凉冷落。

1905 年京汉铁路竣工，1909 年汴洛铁路修通，两条铁路在郑州交会，郑州成了交通枢纽，车站设在县城西关以西约 2 华里。1910 年洛阳至潼关间的洛潼铁路开工，1911 年开封至海州（连云港西南）间的开海铁路有一段竣工，汴洛铁路形成向东西延展的形势，这就是陇海铁路的前身。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由于连接津浦路的关系，完成得比较早一些。洛阳至潼关的一段，则进展十分迟缓，有很长一段时间只通到陕州的观音堂，慢慢地才通到会兴镇和陕州，至 1930 年蒋阎冯大战结束时，也只通到灵宝，1931 年通车到潼关，1934 年通车到西安。由于交通便利，郑州的人口渐增，居民区范围扩大，西至蜜蜂张，南至陇海苗圃，北至张家寨，东面连接城内。几条主要街道逐渐形成，由火车站直达西关的大同路，成为新形成的市区的中心大街。大同路以南有弓背街、

钱塘里、东敦睦里、西敦睦里（后改名银行街）、操场街等；大同路以北有南下街、延陵街、将军第、德化街、福寿街、三多里、商场街、苑陵街、兴隆街、饮马池、二马路等。不久郑州又修建了一处商业市场。1922年郑州自行开放为商埠。

1931年至1935年期间，随着陇海铁路由潼关向西延展到西安，郑州商业交易额不断扩大。据当时统计，全年交易总额仅棉花一项，大约在4000万元上下。为了办理大量款项的汇兑和周转，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为首的各家银行，纷纷到郑州设立分支机构。记得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北洋保商银行、中孚银行等，加上同和裕、豫盛和、信昌、源和盛、豫大、华中、豫成、裕源、日升恒、复兴长等银号，从事金融业务的不下30家。这和1930年以前郑州只有西北银行、河南农工银行及个别银号的情形，与1925年左右只有河南省银行、丝茶银行及少数银号的情形，显然是大不相同了。

在这期间，郑州陆续建立了一些工厂和商号。工厂有豫丰纱厂、中华蛋厂、志大蛋厂、豫中机器打包厂、日信洋行机器打包厂、耀华玻璃厂等十余家。较大的商号有瑞丰祥、长发祥、慎裕等绸缎店；太德、恒记、临记、协记、鑫益、国货公司等洋布店、京鞋店、百货公司、药房等；糕点业有五美长、鸿兴源、老浙华等；饭馆有豫顺楼、鑫开西餐店、万年春、福禄寿、南味茅、雪宫等；金珠店有老凤祥、百华金店、宝华德金店等。此外，大旅社和浴室也陆续开设起来。

郑州商业的发展和棉花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旧中国的纱厂、纺织厂都集中在沿江沿海的大中城市，内地产棉区，只能将棉花打包转运到那里，才能制成纱和布，再运到内地销售，交